

# 农业高质量发展 以粮食安全为重心的逻辑与路径

■徐颖 孙泽生

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基本民生与国家安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当前农业工作的重心,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逻辑,符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建设的历史趋势,符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需要解决我国粮食生产内生动力不足、供需结构性紧张、贸易流通安全受限等问题。为此我国应当在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市场供给安全三方面下功夫,通过调节粮食价格机制、坚持科技兴农提升粮食质量与生产效率、完善市场布局与产业链建设等措施提高粮食安全保障系数,从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入手,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推进。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3)04-0180-08

徐颖,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234)

孙泽生,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上海 200234)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与任务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之根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既面临人民群众农产品消费习惯的内生变化,也面临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极大提升的外生约束。在国内层面,农产品消费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提高,二是对消费品种类多样性的需求提高。在国际层面,中美大国博弈和俄乌冲突等不稳定因素的叠加,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生产和流通效率受到很大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加剧。基于以上背景,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粮食安全为基础和重心。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列为当前农业工作重点的头条,要求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sup>[1][2]</sup>粮食的低需求弹性和必需品特征,决定了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定与食物主权问题。<sup>[2]</sup>本文旨在从粮食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系入手,论述以粮食安全为重心,支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本文认为,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下,我国粮食安全仍然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粮食结构性供需失衡、贸易风险加剧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并非孤立的,而是与农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许多矛盾有深层次的联系。因此,将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当前

农业工作的重点,既是保障民生的头等大事,也符合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逻辑性、现实性。

## 一、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当前农业工作首要任务的内生逻辑

高质量发展是农业强国的指导方针。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我国将粮食安全作为工作重心有着严谨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确凿的现实逻辑。理解粮食安全在农业现代化转型中的基础与引领作用,有助于把握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进程趋势和目标指向。

### (一)理论逻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直观表达

粮食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对粮食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产量不断攀升,从1949年的1.13亿吨上升到了2021年的6.63亿吨。<sup>①</sup>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一系列农业农村改革,释放了粮食生产潜力,推动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迈入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粮食安全工作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仅事关“吃得饱”,更关注“吃得好”“吃得安全”的问题。“吃得安全”不仅限于微观上的食品质量,还要求关注国际不稳定局势下宏观上的供应安全问题。<sup>[3]</sup>粮食安全所涵盖的食物安全,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在新时代的拓展,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sup>[4]</sup>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人民立场反映在粮食安全上,是粮食产品供应的多元化、城乡居民膳食结构的均衡化、粮食价格的长期普惠化。这些发展趋势正体现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向。我国农业的发展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农业仍是“四化同步”中的短板,高质量发展战略正是基于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能够实现全面现代化筑牢根基,保障粮食安全是事关民生的头等大事,是保证民族复兴战略平稳施行的大计,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直观表达。

### (二)历史逻辑:改革开放以来的粮食治理经验的赓续

历史上,粮农问题一直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努力解决的基础性和关键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解决粮农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与实践,循序渐进地完成了农业生产关系调整、市场机制引入、保障农业生产底线、优化流通体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由于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过去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已经不再适应调整后的农业生产关系。针对此情况,国家于1990年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该文件既将市场机制引入粮食流通领域,又提高了粮食安全系数。保障农业生产底线包括确保产能与保护耕地两个方面。在确保产能方面,2004年之后国家出台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辅以“两减免、四补贴”机制,兜底农民种粮利益;免除农业税,提高财政扶持力度,建立奖励机制,鼓励产粮县的生产积极性。在保护耕地方面,《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明确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并对农田等级划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的改造给予了指示。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连续出台中央一号文件,在支农政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加工与流通设施建设等方面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中心,进一步巩固粮食安全。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农业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依托国内较成熟的粮食加工产业与物资流通体系,我国在探索粮食安全“双循环”发展方面卓有成效。目前,我国粮食商流、物流市场达到500多家<sup>[5]</sup>,同

时以“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为契机,建立起了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键性粮物流节点和贸易运营网络<sup>[6]</sup>,着力实现供给多元化和供应链安全稳定。2020年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在防范粮食市场风险、化解生产隐患与应对市场供应等问题上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危情,有效解决了口粮生产供给问题,农业发展稳中求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高质量发展的农业,不仅能给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农产品,还具有高质量的农业生产体系,最终提升农民的生活品质和农村社会经济水平,这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艰难探索逐渐建构的农业发展道路。在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情下,我国以和平、友善、可持续的方式解决了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形成了农业治理的成熟经验,对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与历史意义,为提升世界总体农业发展质量和水平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 (三)现实逻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与前进推手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其中,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也是衡量农业发展质量的标准之一。我国政府将粮食安全作为当前农业工作的重心与基础目标,有助于改善农业生产状况,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面对2022年以来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点任务。就我国粮食安全的未来发展而言,短期内我国对粮食供需平衡的要求将会更高,粮食生产面临着供需两方的双重压力,供需平衡结构性分化趋势明显。从中期来看,我国农业内部发展面临着确保产能稳定增长的内在压力,以及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外部供给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风险。<sup>[7]</sup>长期来看,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农业和农村,尤其是粮食主产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农民尤其是粮农更是共同富裕目标的薄弱环节。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短期看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与粮食主产区的生产积极性,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地方农业发展不平衡问题。长远来看,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势必会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推动粮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粮食产业链长度与增值能力,以上下游产业链拓展带动农业全产业链的升级。因此,解决好粮食安全问题有利于农业生产资源全要素聚合,促进先进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从而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有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

## 二、高质量发展目标下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2003年至2022年间,我国粮食实现了十九年连续丰收<sup>[8]</sup>,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做到了独立自主解决十四亿人的吃饭问题。然而,我国粮食供求平衡是一种“紧平衡”,且正处于从旧产能模式向新产能模式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面对十四亿人庞大的粮食需求,我国在粮食生产上仍需保持存量。另一方面,要达到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粮食生产需要从数量提升导向往质量提升导向转轨。粮食安全问题仍是我国需要密切关注的头等大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定义,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的食物,满足其过上积极、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膳食偏好”<sup>[9]</sup>,可将粮食安全细分为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市场供给安全三个方面,下文分别进行讨论。

### (一)数量安全问题:粮食生产内生动力不足

粮食价格机制是影响农户粮食生产积极性最敏感的因素。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粮食主产区补贴政策,但粮食生产仍然存在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自从粮食市场化

改革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最低收购价政策、临时收储政策、政策性粮食竞价交易为主的粮食价格调控体系。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障了种粮农民的收入预期值,在维持国内粮食市场价格的稳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因为要将粮食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致使收购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与此同时,粮食生产资料价格却逐年攀升,尤其是在外部环境不稳定的条件下,农资生产与物流受影响较大,提高了粮食生产成本。2015—2020年,种粮亩均总成本平均年增长0.54%,同期每亩粮食平均售价却下降了1.2%<sup>②</sup>,成本投入与经济收益“一升一降”双重积压,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主产区往往经济欠发达,政府既要考虑粮食储备支出,为了保证粮食产量又需考虑种粮补贴支出,导致“粮财倒挂”现象出现。<sup>[10]</sup>主要粮食生产地区对粮食生产的贡献增加,财政收入却在减少,导致粮食主产区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现有的粮食价格政策也影响了粮食交易市场及相关产业。当最低收购价低于市场价格时,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当最低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格时,市场机制对价格的调节功能将会遭到破坏,使得粮食加工产业链上下游的价格受到牵连,影响加工企业升级。

### (二) 质量安全问题:供需失衡导致结构性紧张

粮食质量安全分为营养安全与品质安全,对应FAO定义中的“安全和营养的食物”。当前,我国粮食质量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由于供应体系与居民对食品质量和品种的需求不匹配,部分粮食作物存在阶段性过剩、部分粮食存在供给结构性短缺的现象。我国人均土地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数量的三分之一、人均水资源仅为约四分之一,且水土资源分布不平衡问题突出。“南多北少”的水资源与“南少北多”的土地资源格局形成错配,北方地区仅有全国五分之一的水资源,却生产全国一半以上的粮食。在粮食生产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外部环境的动荡、人们饮食结构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突显。当前,我国人均口粮消费量较之前有所降低,但与肉、蛋、奶相对应的饲料用粮以及与其他副食品相对应的工业转化用粮需求量却显著增长。消费者对农产品多样化、品质化的要求逐渐提高,给粮食生产提出了新挑战。以2020年为例,当年我国粮食消费增长8.08%,增长额超过生产增长额7.6%。由于疫情冲击导致生猪养植物资链出现异常,饲用粮食消费增长,又正逢国家临储玉米去库存告一段落,导致玉米的需求缺口增大,玉米进口量比上年增长135.8%。2020年下半年,玉米价格的居高不下使得作为替代品的小麦需求量迅速上升,进口同比增长1.3倍<sup>③</sup>。可见,口粮自给率固然重要,但与主食消费集中的时代不同,居民膳食结构中主食比例的下降意味着口粮自给率与粮食安全水平已不能全然挂钩。粮食消费实际需求和现有粮食供给系统之间的失衡导致了粮食结构性紧张,这也反映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

### (三) 市场供应安全问题:国际局势影响贸易流通安全

受自然资源的限制,我国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口粮生产,在非口粮贸易上对国际市场有较强依赖,但粮食进口源过于集中是我国粮食进口贸易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例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我国在2020年进口了超过1亿吨大豆。在四大粮食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几乎控制着全球粮食贸易链的现状下,我国大豆进口主要集中在美洲。其中,美国作为世界上农业最发达、农业国际竞争力最强、农产品贸易最活跃的国家,拥有世界四大粮商中的ADM、邦吉和嘉吉,是我国大豆和玉米的最主要进口来源国。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粮食贸易体系风险凸显。各国在局势动荡时所采取的流通控制措施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并助长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动加剧了全球粮食贸易动荡,例如2022年5月13日,世界第二大小麦出口国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此举进一步抬高了全球



小麦价格。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地区战争等因素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长期影响,将有更多人面临饥饿问题。2020—2021年度,世界粮食供求安全系数,即本年度期末库存量与下年度消费量的比率达到30%,为21世纪以来的新高水平,远高于17%~18%的安全警戒线水平<sup>[11]</sup>,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粮食供应问题加剧。当前,危机四伏的国际粮食贸易秩序也将进一步加剧我国的粮食安全风险。

### 三、提升我国粮食安全的路向设计

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我国粮食在数量安全方面需要进行价格机制政策调整,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与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在质量安全方面,应当围绕消费需求转变现有粮食安全观,突破农业技术关键瓶颈,依托科技创新实现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在市场供应安全方面,应在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的格局下探索提升我国粮食产业竞争力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内在机理。

#### (一)改善价格机制,发挥政策扶持作用

我国自2004年之后实行以托市收购政策为核心的粮食价格干预模式,并先后将稻谷、小麦与玉米纳入托市收购政策管理范畴。然而,“粮财倒挂”、粮食价格持续走高给下游加工业带来压力等现象是最低价格收购政策长期实施后产生的负面效应。为了在保证粮食市场稳定的同时保障农民种粮收益,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适当提高稻麦最低收购价,稳定玉米、大豆、稻谷补贴政策,为农民从事基础粮食生产加上“保险栓”,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当前,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分为直接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本质上都属于目标价格补贴。目标价格是指政府以农产品市场价格为基础,综合考虑生产成本与收益水平确定的农产品预期价格。生产者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生产销售,政府比对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差额,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将根据目标价格与收购价格的差额、种植面积、产量等因素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国家不予补贴。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是对冲取消托市收购政策不利影响的有效手段<sup>[12]</sup>,其优点在于实现粮食市场定价与政府补贴分离,从而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势引入粮食价格机制当中。此外,最低收购价政策需要配套高额的流通与储备成本,农民得到的实际利益很少,而目标价格补贴机制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转移效率。

实行目标价格政策的主要难点在于信息收集。在农业产品目标定价与市场价格的确定方面,由于各地的农产品生产成本差异、品质差异,统一的目标定价显然无法具有普适性。要进行适合不同地区的目标价格定位,同时兼顾不同规模农业生产单位的种植面积、产量、销售量等因素,其数据统计量是惊人的。因此,尽管目标价格政策早在2014年就受到学界关注,却一直难以全面铺开。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精准测算已经不再是难以破解的技术关卡。在大数据时代,云计算与物联网推动“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建立土地基础数据库的可行性大幅上升,对粮食种植面积、产量等数据的预测与市场价格监测体系也能在技术支持下迅速得到完善。数据直报系统能够实时收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与收益数据,支撑建立精准目标价格测算模型,现在已经广泛投入使用。

#### (二)转变粮食安全观,科技攻关绿色兴农

生产与消费供需匹配失衡与我国传统的粮食安全观有关。在国际关系紧张、粮食生产率不足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形成了以解决温饱为中心、以追求数量为目标的农业发展模式。我国传统

的粮食安全观表现出以下特点：组织方式上以政府统筹规划为主，生产目标上以粮食供应量为准，尽管致力于自主生产，但对生态和水土资源保护不够。在我国人多却水土稀缺的基本国情下，随着人口增长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旧粮食安全观念主导下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要解决粮食供给的结构性紧张，必须转变旧有的粮食安全观以指导粮食生产进行结构调整。首先，扩大传统观念中“粮食”的口径，将更为多样化的食物结构涵括进粮食安全观，更新粮食自给率概念；其次，转变过去对水土资源保护重视不足的态度，坚持绿色兴农，实行可持续健康发展。实践方面，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根据“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总体要求，依托农业技术升级，提升农业生产率，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科技进步是粮食生产的根本出路。例如，以色列作为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的典范，尽管在水土资源方面极为匮乏，却凭借强大的农业科技用4.3%的农业人口养活了800余万国民，同时还是欧洲冬季蔬菜的主要进口基地。<sup>[13]</sup>我国应当借助科技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在关键农业领域实行重点技术攻关，让科技引领生产力发展。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障粮食安全要害是种子和耕地。”<sup>[14]</sup>在种子行业，我国需要对“卡脖子”技术进行重点突破。加快集中力量推行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加强作物种质资源的研发。<sup>[15]</sup>未来我国将以南繁等育种基地为中心，在全基因组编选、高效基因分型编辑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发力，突破育种关键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品种，推动“种业革命”，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耕地利用率上，我国应当加快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建设，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加大投入以节水、节地、节能、节肥为研究目标的耕种技术研发，加快实施节水灌溉和旱地种植技术；开发无土栽培、立体种植、多熟制栽培等节地技术，增强利用我国多物种优势，发展间种、套种、复种等多成熟种植技术提高复种指数；以数字赋能高质量农业生产，引入卫星遥感、远程监测和控制系统等数字农业技术，走绿色兴农之路，提高对环境与生态的监测能力和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以优化粮食生产布局、促进粮食多样化生产与提升粮食生产质量为目标，弥补粮食供需的错位。

### (三)立足双循环格局，稳定进口渠道提升竞争力

在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与挑战不断升级。同时，我国作为粮食第一生产大国、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大国和世界第一粮食消费大国的基本情况将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长期存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为我国未来解决粮食贸易安全问题提供了基本方针。在双循环经济格局下，我国粮食供给安全应当是“以我为主，适度进口”，即内循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础，以国内粮食生产与消费平衡为目标，以进出口外循环为补充支持；外循环以实现国际粮食供需平衡为目标，依托国际粮食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进行贸易流通。双循环经济视角下，抵御全球粮食流通链风险的策略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要稳定获取粮食的途径，二是要提升粮食产业竞争力。

在稳定获取粮食渠道方面，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系统已呈现出国际循环内嵌于国内循环之势<sup>[16]</sup>。在保证粮食自给率的前提下，适度进口粮食能够缓解国内粮食供给的结构性紧张，也有助于加深我国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增强对国际粮食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合理配置。针对粮食进口源过于集中的问题，我国应当努力拓宽进口渠道以保证粮食贸易中的主动地位，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结构。对于大豆等进口量较大、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农产品，我国应当侧重于推行市场的多元化布局，在充分考量大国博弈风险情形下，积极寻找更多合作伙伴，对不同来源国的进口

产品数量进行协调与平衡。上述举措能以优化贸易布局的方式提高我国作为进口大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发言权,方便我国与产地国及国际组织进行深度合作,推进以中长效贸易协定取代短期协定以对冲外部风险。对于进口量较少、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低的农产品,我国可以更多地侧重于推进构建内外联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多层次市场格局,将合作意向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分析比对不同国家的作物与市场优势合理化市场配置,分散集中进口风险,开展与不同层级进口市场的深度交融与合作,在多边主义的原则下构建更为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贸易新秩序。

双循环格局下要提升粮食产业竞争力,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提高粮食质量以外,我国还需要在流通渠道的畅通上、在产业链的完善上、在国际粮食市场的地位上有所提升,这样才能有效保障粮食自主权。在流通渠道上,当前国内物流行业已达到较高发展水平,但是国际粮食物流基地建设还有待加强。尤其是自2020年以来,国际物流系统显示出在设备与设施方面升级的可操作性,如中转设施的建设、新型粮食运输工具的研发等。我国应当加强物流资源整合,提升国际国内基础设施协同性,降低物流成本与贸易成本。同时,还应积极建设关键物流节点,并将其与国际粮食物流点进行对接,保证国内外粮食资源信息能够及时反馈,提升物流供给安全性。在产业链的完善上,应当重视粮食产业链网络的构建。粮食产业链网络是指处于粮食产业链上下游的不同市场主体通过契约、一体化等方式,进行纵向与横向的并购、结盟或者合作建立网络,不仅包括生产、加工等多个环节的纵向结合,还涵盖农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横向拓展。<sup>[17]</sup>完善的产业链网络具有强大的资源与市场整合功能,能够将业务横向扩展到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对提升我国粮食的竞争力大有裨益。国际上,四大粮商通过统一安排包括粮食收购、运输、国际出口的一体化运作,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占有话语权优势。我国在粮食产业链网络的建设过程中同样可以对标其运营模式,改革国有粮食企业运营系统,将粮食收储、加工、分销等多个环节进行一体化整合,多企业合作建立产业联盟,重视品牌效应,打造国际知名粮食品牌,提升我国农产品质量水平。

#### 四、结 语

农业高质量发展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大计,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全球安全局势不确定性增加,我国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业作为稳定我国社会基础的“压舱石”,粮食安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最基本的目标与未来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衡量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首要指标。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施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sup>[18]</sup>粮食安全问题与农业现代化转型中的许多问题存在共时效应。藉由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我国能够从物质条件、产业体系、经营方式上对农业进行现代化升级,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国际粮食市场竞争力。成功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能够为我国创造长效稳定的农业发展环境,夯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基础,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助力全国人民以饱满的热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谱写新时代新征程上现代化农业强国的新篇章。

注释:

①以上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

②以上数据来自前瞻数据库; <https://d.qianzhan.com/>。

③以上数据来自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https://www.askci.com/news/data/maoyi/20210119/1059141332775.shtml>。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梁姝娜.食物主权:实现持久粮食安全的基础[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3]武舜臣,赵策,胡凌啸.转变中的粮食安全观:理论期待与新粮食安全观的构建[J].农业经济问题,2022,(3).

[4]李悠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负人民的发展答卷[N].人民日报,2023-02-2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安全(2019年10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6]王钢,赵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治理:历程、成效与启示[J].农村经济,2022,(3).

[7]韩杨.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J].改革,2022,(1).

[8]安雪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年站稳1.3万亿斤台阶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J].人民日报,2023-01-23(01).

[9]黄季焜.对近期与中长期中国粮食安全的再认识[J].农业经济问题,2021,(1).

[10]方国柱,祁春节,贺钰.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逻辑与治理机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22,(12).

[11]张蛟龙.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粮食安全:影响路径与应对战略[J].世界农业,2021,(4).

[12]李京栋,李先德.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以稻谷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3).

[13]李晓俐,陈阳.以色列创新资源节约型现代农业模式对中国农业的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15,(19).

[14]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EB/OL].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uanti/2021lhzfzgbg/index.htm>, 2021-03-05.

[15]黎茵.种业创新与国家粮食安全——我国种业资源优势及“卡脖子”技术攻关[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16]魏艳骄,张慧艳,朱晶.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大豆进口依赖性风险及市场布局优化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1,(12).

[17]赵霞,陶亚萍,胡迪.粮食安全视角下我国粮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1,(5).

[18]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N].人民日报,2022-03-07(01).

【责任编辑:陈保林】